

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

——答姜義華先生

• 余英時

姜義華先生(以下簡稱「作者」)〈論二十世紀中國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針對我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提出了全面的質難。作者的態度是嚴肅的，論證是詳實的，使我不能不作一回應。但是我的回應祇能是很簡略的。

首先我想說明，我的原文是根據1988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講詞修改而成的。講詞不能像正式論文那樣推理嚴謹，因而為讀者留下種種推測的餘地。這一點我完全承認。不過讀者如果不斷章取義，我想我的原有論旨還是很清楚的。我的主旨是指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種主要的價值取向及其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變革中所發生的影響。中國近代的變革當然是由無數因素共同促成的，絕不能簡單地歸之於思想一端。但一個社會在某一時代的思想取向基本上支配着它的成員的整體行動，因此也是一種不容忽視的歷史力量。我說「整體行動」涵有中國傳統語言中「時風眾勢」的意思，「時風眾勢」形成之後，儘管有許多個

別成員反對或不贊成它，但對整個社會的動向已失去制衡的力量了。

激進與保守的悖論

作者對我的講詞似乎抱有一種深憂，以為我是在為保守勢力扶輪。所以他說：

這篇演說在海內外都獲得了一批響應者，一時間，呼喚保守主義，譴責激進主義，竟成了一股在學術研究與政治實踐中都頗有影響的思潮。

這段話實在未免太過恭維我的講詞了。這篇流傳極為有限的文字何曾有過形成「思潮」的光榮？至於說到它對中國的「政治實踐」頗有影響，這在我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譚了。我想這大概是出於作者因過於憂世而發生的錯覺。

正由於作者的過慮，因此他的論文全力闡明一個中心論點：即二十世

作者對我的講詞似乎抱有一種深憂，以為我是在為保守勢力扶輪。這實在未免太過恭維我的講詞。這篇流傳極為有限的文字何曾有過形成「思潮」的光榮？

紀中國現代化的挫折主要應歸罪於中國傳統中的種種保守的勢力。相反的，激進主義則是無罪的，因為作者根據魯迅的斷語，認定任何外來的主義也撼動不了中國的保守主義。在這一中心論點的指導之下，作者檢討了中國近百年來政治、社會、經濟等各方面變革的艱難歷程。

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所討論的是和我的講詞屬於不同層次的問題。我所指出的是思想史上激進化的現象，而且重點是放在價值取向上面。這和中國社會上的保守力量多麼強大完全是兩回事情。從思想史的各階段說，由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共產主義運動，激進主義一浪高於一浪，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我在講詞中已有說明，不再重複。我所指的當然是各階段的主流思想。一般而言，每一階段的主流思想都是由知識界領袖所倡導而引起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廣泛響應的。主流形成之後，它對實際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往往發生規範的作用。因為從事實際運動的，集團或個人，無論是出於真信仰或其他不便公開的動機，都不能不利用當時的主流思想以號召群眾。但是激進觀念落在社會實踐的層次究竟是和保守的勢力匯流，還是繼續發揮激進的功能？這一類的問題已遠遠超出思想史的範圍，是我的講詞所完全沒有涉及的。

作者反覆論證：中國的現代化一直受阻於傳統的各種保守力量：與這些強大的保守力量相比，激進主義在中國不是太強而是太弱了。但是我仔細檢查他的論據，主要是取自1949年以後的政治社會的實踐層次。作者似乎是說：1949年以後，中國只是表面上「革命」了，但暗中支配着政治社會

運作的力量仍然是傳統的，而且是傳統的惡化與泛濫。（中國大陸上流行的名詞是所謂「封建遺毒」。）這正是我一向所持的論點，作者也曾引用了我的其他文字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實這個論點和思想取向的激進化之間毫無矛盾可言。一個在思想上激進取向的人，決心以革命暴力摧毀現存的秩序，建立一個理想的新社會，但是由於他出身舊傳統，所熟悉的也是傳統的思維方式和鬥爭手段，因此他在「破舊立新」的革命行動中不可能不大量運用這些現成的傳統資源。「祇問目的，不問手段」本是許多激烈的革命者的基本信條：革命者的言行之間充滿着傳統的——特別是負面的——成分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但這絲毫不能動搖革命者在思想上仍然是激進取向的事實。

至於全面反傳統的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比它所推翻的舊秩序更為惡化，這並不是由於革命者在思想上太保守了，而恰恰是因為他們太激進了。這是一個有趣的「悖論」，這裏不能詳細分析。簡單地說，革命的激進分子總是想掃光一切傳統，然後在一張白紙上重新建造一個理想的社會。但是由於事實上沒有人真能片刻離開傳統而存在，所謂全面反傳統的革命最後必然流於以傳統中的負面成分來摧毀傳統的主流。其具體的結果便是壞傳統代替了好傳統。這一點又和邊緣人必然在革命暴力中奪得領導權有關，此處也不能詳論。（參看我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第六期，1991年8月）所以這個「悖論」也可以歸結為一個歷史的教訓：激進的革命之所以無法創造出一個新的社會正是因為它不能保守和繼承文化傳統中的合理成分。布克

我所指出的是思想史上激進化的現象，而且重點是放在價值取向上面。這和中國社會上的保守力量多麼強大完全是兩回事情。

至於全面反傳統的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比它所推翻的舊秩序更為惡化，這並不是由於革命者在思想上太保守了，而恰恰是因為他們太激進了。



邊緣人必然在革命暴力中奪得領導權

(Edmund Burke)說：「一個國家若沒有改變的能力，也就不會有保守的能力。沒有這種能力，它將不免冒着一種危險：即失去其體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見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a Penguin Book, p. 106)這是保守主義的一種「悖論」，恰好可以與上述激進革命的「悖論」互相對照。

激進理論的絕對權威地位

最使我詫異的是作者似乎完全看不見激進主義在中國現代史上所發揮的巨大作用。1949年以後，中國民間社會的消失便是拜激進主義之賜。作

者所重視的「商品市場經濟」、「社會中產化」、知識分子等現代化的動力都絕不可能離開民間社會而獨立存在。此中最主要的關鍵即在人民的財產權的廢除。財富是文明的物質基礎：現代的理性要求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而不是一切生活資料都壟斷在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階級的手中。作者十分讚頌1949年以後農民恢復了「他們千百年來一直依以為命的小土地所有制」：但是我相信作者大概也知道，這只不過是激進革命的一個極短暫的過渡策略。一兩年之後這個「小土地所有制」便正開始在農業集體化中解體：再過幾年更在人民公社的浪潮中消失了。

作者為了證明所謂「文化大革命」

激進的革命之所以無法創造出一個新的社會正是因為它不能保守和繼承文化傳統中的合理成分。

為甚麼參加者在以暴力摧毀一切時會表現得那樣理直氣壯？為甚麼當時全國沒有一個人曾對「文革」表示過一絲一毫的懷疑？這顯然是因為一個特殊的西方激進理論已在中國取得了「天經地義」的地位。

1949年以後的中國與傳統已徹底斷裂。這個新的政治經濟的結構不但不是傳統的延續，而是在一個特殊的西方激進理論的指引之下，從以前蘇聯的模式中脫化出來的。

的根源在中國的保守勢力，而不在激進主義，竟要求我們不去注意那些表面的口號。但口號之所以能發生那樣巨大的破壞威力正是因為有激進的思想取向作它們的後盾。在心理和行為的層面，我們當然不難在這一場毀滅性的活動中找到許多「傳統的」成分，但這並不是中國文化主流中的傳統，而是邊緣人的傳統。所以它和清末義和團的表現最為相似。然而從思想史的角度說，我們所要追究的問題是：到底是甚麼樣的思想基調使得這種大規模的毀滅行動成為可能？為甚麼參加者在以暴力摧毀一切時會表現得那樣理直氣壯？為甚麼當時全國沒有一個人曾對「文革」表示過一絲一毫的懷疑？這顯然是因為一個特殊的西方激進理論已在中國取得了「天經地義」的地位。我們研究「文革」時代的思想傾向自然不能不以當時的《人民日報》和《紅旗》為最重要的資料。無論我們在發動和推行「文革」的人的身上找到多少「傳統的成分」，我們都無法改變一個思想史上的基本事實：即如果不是那個特殊的激進理論在當時具有絕對權威的地位，這些「傳統的成分」是不可能發生決定性的作用的。如果一個以消滅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號召而激起全國響應的運動還可以解釋為保守主義泛濫，那麼世界上自古及今便根本沒有甚麼激進主義了。

新體制與傳統已徹底斷裂

我想借此機會澄清一個非常嚴重的誤解。這四十多年來，研究中國共產主義發展史的學者，無論在東方或是西方，都特別注意中國傳統中究竟

有那些因素曾經發生過接引的作用。關於這一方面，許多人都曾從各種角度提出了他們的觀察。但是現在似乎漸漸形成了一種看法，認為1949年以來的中國大陸在表面上雖然是共產主義的體制，骨子裏面則仍然是傳統的延續。前面我們看到作者引魯迅的話，也正是為了說明1949年以後的中國並沒有變。在作者看來，即使共產主義是一套最激進的思想，它也無力改變中國傳統的保守性格。

這個論斷與我們所看得見的一切歷史事實完全相反。1949年以來，中國的邊緣人集團憑藉一個特殊的激進理論，運用一種嶄新的極權組織，徹底摧毀了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這個集團以革命暴力廢除了人民的一切財產權，因而全面切斷了中國民間社會的傳統。從1949年到80年代初中國不再存在任何民間自發的組織，包括傳統的宗族、商店、行會、學校、寺廟、同鄉會、詩文社等。至於十九世紀末葉以來新興的現代民間組織從政黨、商會、工會、同業公會、宗教團體、文藝團體、報館、出版社、同學會之類或者已被消滅，或者名存實亡，僅僅成為邊緣人集團直接控制的統治工具。這個邊緣人集團既壟斷了一切財富和生活資料，又有無數軍隊和秘密警察作後盾，它因此擁有對每一個個人實行「專政」的絕對權力。它可以任意給個人劃定所謂「階級成分」或「社會成分」，而個人則沒有絲毫上訴或抗議的餘地。

我們毋須對這一體制作更詳細的描寫，僅就上述諸大端便可見1949年以後的中國與傳統已徹底斷裂。這個新的政治經濟的結構不但不是傳統的延續，而且一切證據都指向一個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即它是在一個特殊

的西方激進理論的指引之下，從以前蘇聯的模式中脫化出來的。一句話，它基本上是所謂斯大林體制 (Stalinism) 的變相。我最近有機會和俄國的漢學家交換意見，他們十分肯定地說：他們60年代初在中國所看到的都是列寧斯大林以來在蘇聯久已實行的統治手段。最明顯的，如所謂「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毫無疑問是布爾什維克的現代傑作，決非中國的「封建遺毒」。「天才論」最先用之於列寧，繼而由斯大林發揚光大了。大陸「文革」時代，任何人不小心塗污或損毀了「偉大領袖」的照片便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這更是帝俄時代沙皇的法律，後來又在蘇聯恢復了。「無法無天」是一句中國罵人的成語，但把它當作正面的價值而認真實踐則是遵循了列寧的遺教。列寧在1918年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界說時便直接了當地稱之為「不受任何法律拘束的統治」(“rule unrestricted by any law”)。所以我們如果稍稍瞭解一點俄國的革命史，特別是從列寧到斯大林的恐怖統治，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究竟是延續了本土的傳統還是現代的舶來品，答案是十分清楚的。(可參考 Richard 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0年，特別是第十八章「赤色恐怖」)

新階級與公民社會

我已說過，我承認1949年以來中國新體制的建立曾得力於本土傳統因素的接引。但這些因素主要是無形的：具體一點說，即是某些思維和行為模式的心理沉澱。至於在有形的制

度方面，新舊之間已完全斷層了。甚至傳統的皇帝和現代的極權領袖之間也決不能相提並論，因為二者所寄身的權力結構在本質上截然不同。作者用「政治一元主義與思想一元主義」這種抽象名詞把古今兩種不同的制度連成一體，這在我看來祇能算是觀念的遊戲。

保守和激進永遠是相對於具體的社會狀態而成立的，因此它們的內容也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的規定。依照作者看法，似乎保守和一元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而激進則是多元取向的。我想這是反映了眼前大陸知識界的一般觀點，但不能用這一觀點來解釋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我們大概不能否認共產主義是20年代中國的最激進的思潮。但當時中國共產主義者所追求的正是蘇聯式的政治一元化和思想一元化。這是出於馬克思激進理論的內在而又必然的要求。祇要你承認了馬克思主義是絕對的「科學真理」，你便不可能再成為任何意義的多元論者。「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追求的中心價值是「民主」和「科學」，這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其取向確是多元的。但是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幾乎從一開始便把新文化運動看作是過了時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科學」代替資產階級的「偽科學」、以「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的假民主」是他們給自己規定的歷史任務。所以1949年以後中國的「政治一元主義與思想一元主義」是中國最激進的革命者歷盡千辛萬苦從西方取經取回來的。這套「經」本來便是最徹底的一元主義，並不是到了中國以後，因為受到傳統保守力量的包圍和腐蝕，才從多元變成了一元。

在這個新的一元主義的體制之

我承認1949年以來中國新體制的建立曾得力於本土傳統因素的接引。但這些因素主要是無形的：至於在有形的制度方面，新舊之間已完全斷層了。

依照作者看法，似乎保守和一元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而激進則是多元取向的。我想不能用這一觀點來解釋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史。

從最近幾年共產主義崩潰的歷史看，所謂「保守」祇是「新階級」用盡一切方法繼續保持其政權；所謂「激進」則是一無所有的人民希望擺脫「新階級」的枷鎖。我願意在此鄭重聲明，就這一特殊的涵義說，我的同情自然是在「激進」的一邊。

國粹學派其激進的程度又高於康有為。如果說康有為的「用夷變夏」是隱蔽的，國粹學派則已是公開的。直截了當以「西粹」為「國粹」，似乎祇能算是激進，而不能稱之為保守吧。

下，保守和激進的涵義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因為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已不存在了。這個體制的最大特色是出現了一個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說的「新階級」。「新階級」是擁有無限而絕對權力的統治者：他們的權力之所以無限而絕對，是因為他們不像舊統治階級那樣多少還受到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的約束。其實這個「新階級」早已為巴枯寧所預見。他在批評馬克思的社會設計時已指出其必將導出一個「新特權的政治科學階級」(“the new privileged political-scientific class”，見Richard Pipes前引書，頁135)從最近幾年共產主義崩潰的歷史看，所謂「保守」祇是「新階級」用盡一切方法繼續保持其政權；所謂「激進」則是一無所有的人民希望擺脫「新階級」的枷鎖，以恢復中斷了幾十年的公民社會。去年(1991)8月底蘇聯的保守派政變失敗後，一個莫斯科的居民在電視上說：「公民社會今天在莫斯科再生了！」這句話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在中文大學講詞中完全沒有觸及這一特殊涵義的保守和激進。也許由於今天語言上的混淆，我的講詞才不免引起了誤解。我願意在此鄭重聲明，就這一特殊的涵義說，我的同情自然是在「激進」的一邊。我在講詞中所說的「保守」並不包括「新階級」所堅持的「專政」，也不包括「新階級」分子以暴力攫取的並以暴力維持的一切「特權」。

國學研究未必就是保守

我的講詞的重點是放在文化方面的保守與激進，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激進化在文化問題上的最顯著的特色

是對於中國傳統的否定不斷擴大與深化。原講詞對此點已多所敷陳，不再贅述。作者之所以特持異議則是由於他對保守和激進兩個觀念另有理解。因此他所列舉的辛亥革命前三種文化保守主義，其中之二便是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和章炳麟、劉師培等的《國粹學報》。但在我們一般的認識中，這兩派在當時恰恰代表了激進的思潮。康有為的「改制」暗中即以西方制度為典範，所以朱一新說他是「用夷變夏」；他的「托古」、「偽經」的主張則開現代大規模「疑古」的先河。這是激進主義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限度。國粹學派出現較晚，其激進的程度又高於康有為。如果說康有為的「用夷變夏」是隱蔽的，國粹學派則已是公開的。他們接受了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因此斷定中國在歷史演進的階段上淺於西方。而他們所謂的「國粹」其實是以西方近代的價值為標準而決定的，如「革命」、「共和」、「民約」等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國粹」。他們甚至相信中國民族西來說，以黃帝為近東王號Nakhunti的譯音。黃帝率領歐洲一支民族名「巴克」(Backs)者先遷至近東，再入中國，征服了土著。章炳麟、劉師培都曾運用他們的訓詁音韻的知識來證明此說，如以「巴克」即《尚書》中之「百姓」，而中國原有土著則是「黎民」。這樣直截了當以「西粹」為「國粹」，似乎祇能算是激進，而不能稱之為保守吧。

當然，在「五四」運動以後，康有為、章炳麟、劉師培等都已成為不折不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這正是因為中國思想激進化的步伐愈來愈快。作者把「五四」以來國學各部門的研究也看作文化保守主義的一股勢力，這一

點尤難索解。學院中的專門業務不一定都和思想上的激進或保守發生連繫。但如果我們把「五四」以後的「整理國故」運動當作一種思想史的現象來觀察，那麼不得不着重地說：這個運動的思想取向恰恰又是激進而不是保守。首先從「國粹」到「國故」便是思想激進化的明證，（這個名詞的使用由章炳麟正式發端，但到「五四」以後才普遍流行。）其次，在「整理國故」的進程中，疑古與辨偽是兩支最勇猛的先鋒隊：它們成功地摧毀了一切傳統經典的權威。胡適在比較緩和的時期說整理國故是要「用評判的態度」還古人以本來的面目（見〈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但在激進的狀態下則說古書中有了許多「喫人的老鬼」，應該提來打殺。（見〈整理國故與打鬼〉）魯迅更為痛快，他在《狂人日記》中說：中國歷史書上寫滿着「喫人」兩個字。這是「整理國故」在思想史上的原始意義，作者的論斷似乎又適得其反。也許作者從1949年以後的歷史階段看，「整理國故」仍然是太保守了，但在20、30年代，這樣對待古籍的態度也達到激進的極限了。

依照作者在文章中的用法，似乎研究中國的古典文獻或器物便會流入文化保守主義或為保守主義提供基礎。這個論斷恐怕還需要更堅強的史實和論證才能建立得起來。此說如能成立，則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也都應該算是文化保守主義的運動了。因為當時西方學人和思想家都在全力推動着他們的古典研究。

的分歧發生在三個不同的預設（assumptions）上面：第一是我的論述範圍以思想史為限，特別注重有廣泛影響力的思潮。作者所討論的問題則已遠超出思想史的範圍。第二是作者對於保守和激進兩個概念的界定和我完全不同。因此他在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上祇看見了各種保守主義，幾乎沒有看見任何激進主義，而我所說的激進在他那裏則都變成了保守。第三、我認為1949年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最重要分水嶺，中國民間社會從這一年起被摧毀了。這一巨變，從思想史的觀點說，無須由激進化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負責。作者對1949年則無特殊的感覺：在他看來，二十世紀的中國祇是現代化一次又一次地因為保守力量的阻擋而遭到挫敗。因此，他根本沒有看到有甚麼激進主義曾在中國發生過作用。由於這三個基本預設全不相同，解釋的分歧是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沒有過分誤解作者的意向，我可以說作者的憂慮是很能引起我的同情的。但是我所說的保守是以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為前提的。這和作者所憂慮的「新階級」的保守主義及其種種變相（如所謂「新權威主義」）毫不相干。「新階級」為堅持其統治特權而虛構出來各種飾詞至少在我的理解中不是以當保守主義的稱號，因為其中並沒有任何值得保守的東西。作者和我的歷史觀察之間儘管存在着許多基本歧異，但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許是一致的。

我可以說作者的憂慮是很能引起我的同情的。但是我所說的保守是以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為前提的。這和作者所憂慮的「新階級」的保守主義及其種種變相（如所謂「新權威主義」）毫不相干。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許是一致的。

1992年2月21日

結 語

總結地說，我覺得作者和我之間